

教師論壇討論肅反估價問題

發言教師多數認為肅反成績是主要的，錯誤和缺點是次要的。政治教研組余瀋陽說，對肅反總的估計，要看清事實，然後還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對肅反的估價得出正確的結論。

六月十八日下午，教師論壇專題討論肅反估價問題，會上發言的教師有煉鐵教研組晏偉、周取定、采礦系郭楠、政治教研組余瀋陽、黃欽若、壓力加工教研組王殿儒和鑄工教研組進修教師古集華等。

晏偉在發言中就肅反的意義、成績和肅反的缺點發表了意見。他認為基本上肅清反革命，鞏固人民政權，劃清敵我界限，提高人民思想和工作積極性等幾方面來看，應該說肅反的成績是很大的。但是在肅反運動中有的缺點很嚴重。他說第一個缺點是鬥錯了許多人，鬥爭方式粗暴；第二個缺點是把思想批判和肅清反革命的問題混雜起來了；第三個缺點是對於被鬥錯的人，肅反後領導沒有很好地向他們進行交待。總之從肅反整個運動說來，政策方針路線是正確的，缺點是嚴重的，善後工作做得不夠好。

周取定發言，基本上與晏偉的意思相同，他說肅反的路線是正確的，如肅反不發動廣大群眾，就難做得徹底。他認為何以產生錯誤與缺點是由于在肅反中患了主觀主義，因而鬥錯了人；但是這不能說是我們的方針政策的問題。

郭楠在發言中對我院肅反工作意見很大。他說：肅反運動在全國來說需要的，正確的，而在鋼院到底是成績主要的還是錯誤主要的，我今天不下結論。我只說，成績是有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接着他說，如果真的是反革命應殺頭，那活該；但事實不是這樣，鋼院的肅反都是臨時湊些材料，道聽途說和根據表面現

察加以推斷，如果不是臨時湊材料，怎麼會鬥錯了這麼多人呢？（當他談到這裡的時候，參加會的人，要求他列舉具體事例）接着他談到鬥爭方式時說：他們把54年的憲法全都忘掉了，鬥爭方式粗暴、謾罵，除沒有打以外，什麼都有。最後郭楠希望黨領導要在整風中徹底把肅反中的錯誤糾正。他說，從鬥爭起到今天，除有少數人糾正外，大部分人還沒聽到糾正；不要拖拖拉拉，因為，這個問題影響人很大，有人兩年到現在還抬不起頭來。

余瀋陽在發言中介紹訪問檔案科崔魯斌就肅反運動情況和一些具體數字來說明肅反運動的成績。他強調說，通過肅反運動後，人民覺悟有了很大提高，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他在發言中還反駁了郭楠的所謂湊材料的意見。他說，郭楠談到肅反是臨時湊材料、道聽途說的，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至於被鬥錯的人，據我了解差不多該平反的人是大多數糾正過了；只有少數人還沒糾正。最後他說，對肅反總的估計要看清事實，同時還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黃欽若在發言中不同意有人亂用“肅反擴大化”這一名詞的說法。同時他在發言中還就劉景芳教授在肅反中的情況作了一些介紹。劉景芳說肅反中黨給他扣帽子，黃欽若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古集華在發言中，就他參加肅反工作的一些真實情況作了介紹，並說明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

院長舉行茶會歡送

彼得里琴柯專家回國 蘇赫多里斯卡姬

六月十四日下午，高芸生院長和魏景昌副院長舉行茶會，歡送彼得里琴柯和蘇赫多里斯卡姬兩位蘇聯鑄工專家回國。应邀參加茶會的有我院各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職工、同學、鑄工教研組的教師、研究生等七十餘人，共為蘇聯專家話別餞行。

茶會上高芸生院長代表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贈送給兩位專家以“中蘇友誼紀念章”並代表全院師生員工宣讀了給兩位專家的“感謝狀”和贈送紀念禮物。

蘇聯專家彼得里琴柯和他的夫人蘇赫多里斯卡姬是兩年前來我國幫助建設的。兩年來，專家辛勤地勞動，已胜利的完成了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使我院教學改革、科學研究、培養提高師資、指導實驗以及在鑄造專業等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

現彼得里琴柯專家的夫人蘇赫多里斯卡姬專家已于六月廿日早晨乘列車登途回國，前往車站歡送的有院長，鑄造專業的師生等。七月九日左右，彼得里琴柯專家也將回國。

群眾，而走中間路線，企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我們黨則為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而與之鬥爭。今天民主黨派不少領導人物當時就是中間路線的擁護者。由此可見，害怕工人階級的壯大，不甘心的領導，幻想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這是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一貫堅持的路線，從未放棄過。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前一段時間，資產階級不少代表人物確曾表示接受黨的領導與黨的路線，但是仍有不少贊同或只口頭上贊同這一點，而資本主義的道路，則還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這是鐵的历史事實。（附：我不否認也有人一貫誠心與黨合作的）

其次，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以後，資產階級分子認為我們黨是土包子執政，對我們黨的領導是不服氣的，他們利用“五毒”向我們進攻。在這一進攻被打退以後，他們還不斷與我們黨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作鬥爭，幻想永遠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唱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論調。由于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強大力量，由于農民在支持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分子看到大勢所趨，才接受黨的通過贖買而和平改造的政策。現在改造剛剛基本完成，難道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就甘心被消滅了嗎？就對資本主義毫無留恋了嗎？絕不是這樣！他們當中不少人仍然對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有抵觸情緒，這一情緒，就不能不通過種種形式反映出來，而且會集中反映在某些人身上。

再次，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年青的制度，在全世界只有四十年的歷史，在中國則只有幾年的歷史，而資本主義制度却有長得多的歷史。資產階級民主的思想有長期的、深遠的影響，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是其最好的市場，這點在中國也不例外，決不能忽視。同時，今天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尤其高級知識分子是長期受過資本主義教育，站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對資產階級民主一直是嚮往的。這種思想影響，難道新中國成立後幾年中就能加以消除了嗎？

從上述歷史、社會與思想的情況，可見現在還有那些堅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未曾得到真正改造的人（尤其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頑固地要走資本主義的路，對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看不順眼，說妨礙“人民”（實際是他們的“民主”、“自由”，而要反對它、改變它，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什麼不可想象呢？所以右派分子的進攻，完全是其有歷史的、社會的與思想的根源的，並非什麼偶然的事，更不是無中生有，故意吓人的。

右派分子的策略的破產

右派分子往往是善于耍兩面手法的，他們過去可以心裏反對黨的領導，表面却舉手贊成，因為否則他們就不會取得今天的政治資本了。整風運動開展以後，當人們紛紛善意地向黨提出批評與建議的時候；當人民內部種種矛盾、黨在工作中的錯誤及某些黨員的缺點在許多地方被揭露的時候；他們便認為時機已到，

（下轉第四版）

右派分子的進攻是偶然的嗎？

——略談右派分子進攻的歷史的社會的、與思想的根源

楊瑞光

在討論儲安平的反動言論中，有人說“他是知無不言地向黨批評，你們却說他向黨進攻”，又說“他口口聲聲接受黨的領導，你們却給他扣反對黨的領導的帽子”，因而為儲安平抱不平。我認為這些人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是對當前形勢還看不太清，頭腦欠清醒，警惕性不高。這裡我不對儲的發言作具體分析，只談談進行這一分析時而不可忽略的當前的形勢。

當前形勢的特點

當前形勢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右派分子利用整風機會向黨的領導進攻，其目的是要用資產階級民主代替社會主義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要中國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的路，所以反對右派分子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兩條階級路線的鬥爭。

先請大家看看下面種種言論吧：

第一類：“宗派主義的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人大”與“政協”就象兩朵紙花一樣點綴着民主的門面。……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大多數群眾是領導上的應聲蟲”。“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黨已經面臨危機的時候了”。

第二類：“馬列主義理論都是很早時期寫成的，搬到中國來很多地方對不上號。”“資產階級已經不要改造了，工人階級也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學習的，倒是工人階級應該向資本家學習許多優秀品質。”

第三類：“生活水平降低了”。“豬肉都被幹部吃光了”。“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定息應該延長二十年。”說成績是主要的，就是教條主義與黨八股，是“歌德派”。

第四類：“黨委退出學校。”“公方代表撤出合營企業。”“各黨派輪流執政。”“搞一個政治設計院”。“民主黨派最好發展到一兩百萬，搞一個上議院。”“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

不必多舉了。綜觀上述這些謬論，不是分明構成這樣一個“設計”圖嗎？——共產黨領導就是從黨中央到基層的黨獨裁統治，黨領導的結果是一團糟，民不聊生；黨的理論基礎只是教條，資產階級分子不必再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與改造；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取消黨的領導權，根本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讓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處理國家大事，由他們上台領導，至少也要與共產黨平分領導權。這個“設計”圖自然是會使他們滿意的，這樣才是“以德治人”。可是，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國家是繼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繼續走社會主義的路呢？還是要走資產階級所要走的路呢？請大家去下結論吧！

右派分子的進攻並非偶然

右派分子這次公開向黨的領導，向社會主義民主制進攻，其出現似乎是突然的。因而使不少人的腦筋一時還轉不過彎來，表示懷疑。但是這種現象之產生，並非偶然的，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與思想根源。認清這些，就不會對這一現象覺得不可想象了。

首先，現代中國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的正确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的錯誤乃至反動路線的鬥爭是始終在進行着的。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即有初步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的革命路線與胡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路線的尖銳鬥爭。歷史過程否定了改良主義，進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有共產黨所代表的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右派的害怕發動工農，反對共產黨而企圖與反動派妥協來發展資本主義的路線的鬥爭，結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利用。後者在取得政權後，右派就依附了他們。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資產階級中一部分右派分子投靠蔣介石，一部分則幻想不要黨的領導，不要工農

如何治理学校?

也談治校

煉鉄教研組 陶少傑

電冶教研組 關毓瓏

一、在高等学校中要不要党的领导，党能不能领导。近来在治校問題上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如刘景芳先生)認為應該把学校交給內行人(教授、講師、助教而不問是黨員或非黨員)來辦。反對党委治校。即反對党委在学校中包辦一切，統治一切。反對学校中党政合一。要求以校務委員會治校。教授、講師、助教、职工、學生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以院長為當然主席，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在学校中設立党支部，領導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輔助各种工作的實施或完成。

另外有人(如馬如璋、李救功先生)認為要有党的领导，但不要党委制，由民選或普選產生的院務委員會為学校的最高決策機關。党的決議通過黨員院務委員在院務委員會上提出並討論，做出正確結論。

另一部分人認為高等学校中必須有党的领导，主張實行党委制，但應改進領導方法，擴大民主，充分發揮教師(尤其是教授)的作用。

第一種意見是取消党委制，把学校交給內行人(实际上是只是懂得教学和科学的人)來辦，把党的工作限制在只是領導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輔助”各項工作的實施和完成，这实际上是取消党的领导。

第二種意見在表面上看来是承認要党的领导，但剝開来看是要党放棄領導或取消党的领导。馬先生認為黨員應該有自信，能被選入院務委員會，但試問在現在的高等学校中象馬先生所說的黨員內行人(既精通教学業務，又有高度馬列主義修養，懂得社会主义教育原則的)能有几个?有些黨員即使在教学業務上算是內行，但在掌握党的方針政策上是否一定能內行呢?能不能在院務委員會上確實起到貫徹党的意图的作用呢?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党就可以放棄領導?

因此上述三種意見的主要分歧，实际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問題。那么在高等学校中要不要党的领导呢?談這個問題的基本条件在于怎样才能办好学校。

关于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同志發表過意見，肯定地說，高等学校不能沒有党的领导。

首先，今天的学校培養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設人材，誰能領導大家來建設社会主义呢?只有党。

領導学校不是單純的業務領導。刘先生所說的在教学業務上是內行的內行人在办学上不見得一定是內行。办好学校單靠懂得數、理、化是不行的，還一定要懂得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則，要善于組織群眾，發動群眾。解放前後曾經有很多学校進行過“教授治校”和“校務委員會治校”。正象有些有經驗的老先生所指出的，这是宗派、寡頭政治的源泉，少数人把持校政，建立宗派、互相排擠、爭名譽、鬧地位的事情是不勝枚舉的。因為少数教授或校務委員是不易很好聯繫群眾，發揮群眾的力量，更不易掌握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則。例如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學習苏联，必須積極進行教学改革，這些工作如由教授或民選出來的校務委員會來做，能否有党領導的那樣明確有力，能否取得今天的成績，恐怕是有疑問的。

因此，誰最能大公無私、掌握政策、團結群眾、發動群眾來辦好学校呢?沒有疑問，只有黨!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党一直是不会到会的。有了馬列主义原則，並能結合我国具体情况來运用，永远是战无不胜的。在革命初期，剛建立起党的軍隊，党並不会治軍，但事实証明，通过实际斗争，不仅學會了建軍、治軍，而且建得很好，治得很好。在革命剛勝利時，有人認為党不懂得也不会管理城市，不会管理經濟，但事实証明，党不僅學會了，而且管理得很好。在开始时党不熟悉領導建設，領導大規模的工業生產，但几年来党完全掌握了，也領導起來了。那么有什么理由說，党在領導科学和教学方面就將永远是外行，就不能領導!

就从解放几年来党在領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績來看，也可以肯定地說，成績是主要的、肯定的(我們不同意那種籠統地認為凡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就是教條的說法)。不

必詳細地來分析在教学改革、學習苏联等方面的成就，只要看看我們的成品的数量和質量，就可肯定这一事实。在解放前高等学校在校人數最多的一年有155,000人，而1955年有292,000人，1949年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數為31,000人，而1956年有180,000人。从数量上看是非常明显的。从質量上看，不可否認，在解放前的确有些學生的質量不差，但畢竟是少数，有很多是混文憑的。在今天，虽然由于大学招生來源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学學生的質量，但就拿鋼院來說，我們想决不会有人承認現在的畢業生的平均質量是比解放前差吧!

誰又能說这不是党的领导給予的保證呢?

我院过去在党委領導上是有缺點的，某些学校領導人還不懂技术；工作方法簡單、不深入，沒有能更好地發揮教師們(特别是教授)的作用，因此这几年来沒有獲得應該獲得的成績。但这决不象馬如璋先生所說的是由于“党委制”的緣故。这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執行中發生的某些偏差。党委制决不会使党脫離群眾，共產党的基本政治路線就是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們沒有根據說党委制會引起脫離群眾，形成三害。問題在於每個黨員以至於党的领导是否能很好貫徹群眾路線的問題。因此今天的問題不在於取消党委制，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相反應該加強党的领导。党不僅應該領導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應該領導教学科学研究工作。

二、党委如何領導高等学校。

总起來說，办好高等学校的關鍵問題在於保證党的领导 and 擴大民主。換句話說，一方面能确切地掌握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則，另一方面又能充分發揮群眾力量，集思廣益來改進工作。

為要達到这一目的，我們同意党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並成立院務委員會。

院務委員會的委員可由協商或民選產生。

党委對校中問題，無論是校方針也好，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相互位置也好，教学計劃也好，學生學習情况也好，都應該了解，都應該研究，同时要提出方案，建議院務委員會討論，院長決定執行。

院長一方面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來辦理学校，應該对高等教育部負責，也必須受学校党委的領導，貫徹党的治校方針(無論院長是否黨員都必須如此)。

為了使党的決定能够更好地切合实际，在擬訂过程中必須深入下层，广泛了解情况，充分征求群眾意見，不能單凭組織系統的汇报。这样虽然大部分党的負責干部对教学和科学研究还是外行，但通过群眾、依靠內行，也就能夠把这些还不很內行的工作領導起來。党委制訂的方案提請院務委員會進行充分討論。假如方案是切合实际的，那么也就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如果方案不切合实际，那么可以根据院務委員會上的意見修改執行。黨員無論在院務委員會上也好，在各教学、行政單位也好，必須充分宣傳說明党的政策方針，保證党的決定的貫徹和完成。这样把党的意图決策，變為行政的決定去貫徹，避免簡單地通过黨組織來佈置工作。这样也就不会再有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情况和錯覺了。这样才是真正的加強党的领导。

最后还要提一下，為了党委能把学校領導得更好，黨員，特别是党委成員必須加強學習、掌握業務，把自己變做真正的內行人。

與馬如璋先生“關於民主治校”一文的商榷

朱明德

馬如璋先生在第75期院刊上發表的“關於民主治校”一文，乍看起來，好象是馬先生主張“党委治校”的，但再一細看，好象又把“党委治校”否認了，使我越看越糊塗，因此，僅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見向馬先生請教。

馬先生一面談到“党是應該而且能够領導高等教育”的，在高等学校党也應該起領導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党委制是有缺點的”。並舉出“党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員很少，而党委委員中真正参加教学的黨員更是寥寥可數，佔絕大多數的是行政部門的黨員，这样就使得決議容易帶片面性”。同时还談到“由于学校事由党委討論決定……使得党的干部的作风簡單化，而不去征求群眾意見，不走与群眾商量的

群眾路綫。”因此，認為為了办好学校，必須擴大民主，就必須尋找比党委制更適合的形式，而这一形式就是“把選舉產生院務委員會作為学校的最高決策機構”，以上就是馬先生的論証。

我感覺馬先生在分析党委制的缺點時，一方面在強調党的群眾路綫；但另一方面，又把群眾路綫和党委制對立起來。如說“現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黨員很少，而党委委員中真正参加教学的黨員更是寥寥可數……这样就使得決議容易帶片面性；”“由于学校事由党委討論決定……这使得党決議的干部的作风簡單化，而不去征求群眾的意見，不走与群眾商量的群眾路綫。”我認為馬先生的論點是錯誤的。当然，党委委員能够懂得如何办教育，这一定是非常主要的，正因如此，所以要求党的負責干部要虛心向群眾學習，努力把自已由外行變成內行。但問題的主要關鍵並不在此，而是在于党要聯繫群眾，采用各种方法来吸取群眾的意見，如果能作到這點，即使党委委員還不是全部內行，也能作出全面而正確的決定。反之，党委委員全部都是参加教学的黨員，如果不聯繫群眾，不虛心傾聽群眾的意見，作出的決定也必然是片面的。同时，学校事由党委討論決定，与党的干部不走群眾路綫，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因此，我們認為党委制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不應把党委制和党在領導学校中現在的一些缺點和問題混淆起來。我感覺馬先生正是犯了這個錯誤，所以急于要尋找一個自認為比党委制更適合的，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來代替。这样一來，所謂党的領導就不知不覺地在馬先生的腦子中消逝了。我認為既然高等学校是培養忠實于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人材，那就必須要有党的领导，如果沒有党的领导，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保證達到上述的目的。因此，在高等学校党的領導問題，應該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原則。

我是贊成党委制的，同时也認為党委應該克服过去在領導办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缺點；應該更好的發揚民主，听取老教師的意見；更多的尊重各民主黨派和无黨派人士的地位和党外行政負責干部的職權，在党委領導下，很好發揮院務委員會組織的作用。至于党委應如何領導办学，擴大民主、改善作风，接近群眾等問題，還需要同志們更多的發表意見。

总起來說，从馬先生全篇文章的精神來看，虽然提出了党委領導是必要的，但从所有的論點來看，我認為馬先生实际上是贊成“內行办校的同路人”，这样看法是否恰当，仅提出來与馬先生商榷。

黨的領導不容削弱

——对馬如璋“關於民主治校的意见”

山川

在治校鳴放會上，馬如璋先生对民主治校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最近又詳細讀了發言全文(見北京鋼院75期)，有些不同意見愿提出商榷。

馬同志發言的中心內容是以“普選產生的院務委員會作為学校的最高決策機構”。文中首先提到“党是應該而且能够領導高等教育的，在高等学校里党也應該起領導作用”。但是，“党委制”是有缺點的，“因為党委會有最後的決定權……，而這種決定權只是在全體黨員的會上作出的”。“由于学校的事由党委討論決定”，“这就使得党的干部的作风簡單化，不走与群眾商量的群眾路綫”。基于要走群眾路綫來貫徹党的领导，馬先生提出了“由選舉產生的院務委員會來治理学校”。

这里我們不能不探討一下“普遍產生的院務委員會治校”的內容和實質以及如何體現出“在高等学校里党也應該起領導作用”的善良愿望。

首先必須弄清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問題。“党委制”(实际上目前是党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人們稱之為党委包辦制)的由来是由于党在領導学校中犯了“三害”病(这里不想多分析)，致使教師們办学的主人翁态度淡薄了，但这絕不是高等学校加強党的领导(党委中熟悉業務的为数不多)的必然产物，因此討論治学的根本問題在於帮助除“三害”；但同时更不能忽視在加強党委領導的基础上，寻找更能發揚民主的措施。

提出“普選的院務委員會治学”的人，主張不分党与非党，一律“平等”，劝告“共产党员不必忧心自己在院務委員會中的席位如何”。他們的理由是“好的共产党员一定全被

(下轉第三版)

查清真相，分明是非
高、趙兩位教授爭論一事訪問記

陳斯利 都德良 姜淑玉

看了關於高貽善和趙錫霖兩位先生在教授座談會上發生爭論的兩張大字報，引起我們的疑問。為了把事情真相弄清楚，我們訪問了高、趙兩位教授，同時訪問了那天參加會議的右心圃、王正生、尤乙煦、蔭興階、劉之祥、謝家蘭、于學禮、華鳳謙、劉景芳、劉寶智等十位先生，還訪問了會議的記錄人謝為楠（群眾）梁寶珠（黨員）兩位同志。

我們訪問高貽善先生的經過：他首先把發言中說的問題敘述了一遍（見第63期院刊），其中關於軋四寫信給毛主席的問題，高先生說：“當時談話的主要意思是看了軋四同學給毛主席的信很受感動，認為很好，應該培養學生對一些根本問題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應東風吹來東倒，西風吹來西倒，要教育青年一代成為能分清是非的無產階級戰士，能經得起考驗”。在會上發生疑問一事，高先生說經過是這樣的：他說完話後，坐在他對面的趙錫霖先生站立起來問“你的發言是代表黨委說的呢？還是代表你自己？”高答：“是代表自己”。趙接着說：“代表你個人的，請你全文發表”。高說：“好”。趙先生說完就坐下來，開始了自己的發言（見第63期院刊）。把同學整一整、壓一壓的事，高先生說他並沒說過，不知從何而來。另外高先生還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發生的看法，並準備寫出來發表。

我們訪問趙錫霖先生的經過：他首先承認自己在那天會上的發言是不對的，主要由於自己性子急，修養差所致，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不過趙先生認為：“事情已過去了，算了吧，我會後已與高先生交換了意見”。接着他敘述那天會上的經過：高先生是第一個發言，在發言中，大道理講的比較多，同時對軋四同學寫信的問題提出批評，當時是怎樣說的已記不清，總的一個印象對學生的批評還是比較重的，不過院刊上發表的較簡單，（院刊發表的是高貽善先生發言稿的全文，並未作任何刪改——編者

按），看不出有這個意思。趙先生說他當時的想法是：正值鳴放初期，高先生就這樣批評學生，會對今後的“放”有所影響，因此站起來問：“高先生你是代表黨委講話呢？還是代表那個組織呢？”高答：“代表個人”，趙又問：你認為同學寫信不對嗎？我認為具體事情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認為同學給上級寫信都不對，請把這個問題整理發表”。“壓一壓、整一整同學”這話他說高先生並沒有說，他也沒有講。據趙先生說：“同學可能是聽劉先生說的”。我們問：“是那位劉先生？”趙答：“可能是劉景芳先生”。我們說：“劉景芳先生沒有參加座談會”。趙說：“可能是劉寶智先生”。

除高、趙兩位先生外，我們訪問的其他八位先生，對當時情況的敘述，大體可分為兩種意見：

(一) 趙先生站起來問高先生時，有兩種說法：

(1) 問：“你的發言是代表黨委呢？還是代表個人？”答：“代表個人”。問：“是你個人意見，請整理全文發表？”答：“可以”。聽到這種說法的有王正生、劉之祥、謝家蘭、于學禮、華鳳謙、謝為楠、梁寶珠等七位。

(2) 問：“你是代表民盟呢？還是代表你個人？”答：“代表個人”。問：“軋四同學寫信給毛主席你也認為不對嗎？（這句話只有尤乙煦先生聽到，其他先生印象模糊，但是大都記得好像是在趙先生發言中曾說：“難道同學給毛主席寫信不對嗎？”在發言時並沒有提。）請你整理全文發表”答：“可以”。聽到這種說法的有尤乙煦先生。蔭興階先生只聽到前面的一句，後面的已記不清楚了。石心圃先生因有耳疾，距離又遠，對高先生整個發言，聽得都不清，但對趙先生站起來發問和會場一度緊張的情況是看見的。

(二) 關於軋四同學寫信的問題，也可歸納為兩種理解：

(1) 高談到學生政治思想工作不夠時，曾以軋四寫信為例，認為學校政治思想工作好的話，不會引起學生此舉。這樣理解的有王正生、劉之祥、于學禮、謝家蘭、華鳳謙、謝為楠、梁寶珠等七位。其中有個別先生已記不很清，但總的印象，不是批評學生寫信不對，而是批評學校政治思想工作不夠。

(2) 高在發言中，對軋四同學寫信給毛主席認為不合組織手續，不應越級到中央，假如都給中央寫信，那就太亂了。這樣理解的有尤乙煦先生。謝、華兩先生也有此理解。石老先生仍未聽見，趙先生已記不起来了。

至於“壓一壓、整一整學生”這個提法，我們訪問過以上的幾位先生都沒有聽見。因為我們訪問趙先生時他曾說：“學生是聽劉先生講的”，劉之祥先生已訪問過，他說沒有聽見。繼後我們又訪問了劉景芳先生，劉先生說因病未參加會議。為了進一步把事情真相弄清楚，最後決定訪問了劉寶智先生。

劉寶智先生說：當時情況是：趙先生問：是代表黨委呢？還是代表民盟？答：“代表個人”。問：“你認為軋57.2班同學給毛主席寫信不對，該整一整嗎？你的發言是否以全文發表，讓大家討論一下”。答：“可以”。根據劉先生的看法：高先生在提到軋57.2班給毛主席寫信的問題，主要是責備學校思想工作做的太差，否則不會發生此事。而趙先生當時則認為是：當時正是鳴放時期，學生給毛主席寫一封信就認為不對，而提出批評，將會阻礙鳴放，由於高、趙兩位先生的出發點不同，而有不同理解，故在會上趙先生對高先生提出疑問。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趙先生認識到自己做法不對，能接受大家的批評，這是很好的，事實也的確如此，趙先生在高先生發言後的發問，不能不使高先生感到有些壓力，同時這種作法也與中央提出的“百家爭鳴”的精神不相符的。大字報上的要“壓一壓、整一整同學”的說法，也就更是擴大事實了。

以上是我們對此事訪問的經過。希望貼大字報的同學能交待一下，“壓一壓、整一整學生”這句話的來由。

談談我的看法

祝伯豪

我閱讀院刊第71期刊載了“6月4日教授座談會爭辯剪記”的報導一文，其中有一個問題，我也想來談談我個人的看法，也可能是不完全正確，尚希同志們批評指正。

劉景芳先生在座談會發言中最後談道：“今天我們幫助黨整風，我們對黨，尤其對黨員的要求是高的，我們應該把問題提高到原則上來分析才是對的，才是對黨負責的。”這種談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看這要求並不高，是同志式的批評幫助，對黨對人民都有好處。

但是，我不同意劉先生所舉的那個例子，把魏院長接受福利費100元，說成是“見利思義”的問題。既然劉先生在談話中已說過“雖說當時生活有困難”，這也說明了劉先生已承認了魏院長當時的生活情況是困難的，那為什麼不能享受福利補助呢？理由是什麼呢？是“黨員”不應該享受嗎？是“領導同志”不應該享受嗎？我所知道的冶金部頒發的福利費使用辦法也好，國務院的制度也好，都沒有這樣不合情理的條文規定，所以，象說魏院長“見利思義”這種不恰當的帽子，還是不扣的好，這樣的扣法，能說是“提高到原則上來分析問題”嗎？

還有劉先生說：“當時魏院長是否勸告過徐文興不能這樣作沒有呢？實際上，魏院長沒這樣做，結果領導便給他的干部抓了小辮子，因魏院長拿了一百，徐文興便可拿二百，所以我認為這是件大事，不是小事”。

由劉先生這段談話，我理解（可能是主觀）劉先生一定認為徐文興（他是福利委員）給魏院長主動送去福利補助費的行為是非法的，我認為假若是這樣看法那是錯誤的，這樣主動的解決同志的生活困難問題的作法是完全合法的。也是有根據的。

根據冶金工業部，（前重工業部）1955年10月編印的“重工業部學校財務工作手冊”中刊載“重工業部1954年5月21日抄教字第86號函”抄轉“高等教育部1954年5月13日（54）人勞楊字第53號通知”關於高等學校工作人員福利費使用辦法的通知中第七條（二）……對工作人員的困難補助除有賴其本人據實申請外，各主管部門亦應根據情況主動的提出應補助的對象及補助數目（不必一律通過本人申請、小組評議的方式）。……

並且在那年的春節，由徐文興經手主動慰

問補助的，並非魏院長一人，據我知道的共有143人。其中教授及副教授4人，講師12人，助教5人，科長以上干部（包括魏、張院長）9人，一般職員34人，勤工人員47人，教學輔助人員28人，托兒所保育員4人。難道說這些人都是“見利思義”么？

劉先生又說“因魏院長拿了一百，徐文興便可拿二百”。據我了解，在那次春節補助里，徐文興是一分錢也沒有拿的。雖然後來徐文興也曾申請過福利費，但都有福利委員會主任的審批手續；也並非魏院長批准，又怎能說明他是“抓了”魏院長的小辮子，魏院長雖是一院之長，但這福利費的具體審批工作，並不是魏院長親自來辦理，這是眾所周知的。

我們應該把一切具體事實，加以分析，提高到原則上來認識，這樣要求領導，要求黨員是對的。但是沒有調查分析，就提高到“思想品質”，看作“不是小問題”也未免太武斷了吧！實事求是的研究問題，還是對我們思想提高，分辨是非都有好處的。

我完全同意最後劉寶智教授的發言“有的問題，決不能太早或輕易的就給下結論”。

給工人同志們的一封信

鋼院的全體工人同志們：

在幫助黨整風的時候，我們提出了評工資和福利等問題，竟在這上面打起圈子來了，忘了反革命想乘機鑽空子的事！工人同志們，我們相信黨對我們的切身利益問題會給以適當解決的。不要老在這些問題上打圈子！同志們行動起來和可恥的反革命分子做無情的決鬥！我們還要告訴反革命分子“共產黨是我們的親人，我們工人將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我們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就沒有工人的幸福生活，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要緊緊的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工人階級永遠也是共產黨的最親密的人！我們和黨和全國人民站在一起，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向反黨反人民反革命壞分子，做堅決的、無情的鬥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同志們我們是工人階級，不要忘了是共產黨把我們從火坑里解放出來的，我們要團結起來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我們高呼

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此致
革命的崇高敬禮

你們的同志 伙食科全體炊事員

（上接第二版）

群眾所認識，我們一向認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這裡不正是表達我們這一方面的信心嗎？”。此外，我覺得還應該再回顧一下馬如璋同志文章中的“誰是內行”一節。他在这里提到“真正的內行應該是既懂業務又懂得馬列主義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人。可是在這兩方面都精通的人是少的”。現在的教師們的覺悟水平與前幾年相比是大大的提高了，對社會主義事業（包括教育）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所以對政治是能夠提出很多正確的意見的”。從這裡又可看出馬同志提出的“普選的院務委員會”是完全能治好學校的。又一次“提醒”人們在這一問題上也不必過多的耽心高等教育的命運。因為被選入院務委員會的黨員還可以院務委員會成員的資格“把黨委的決議，在會上提出並討論，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結論”。若“只凭干巴巴的幾條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學校的”（？）我想這也是不同意“黨委制”的理論根據吧！

是的，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中是相信群眾，並時刻重視群眾積極性的無限發揮的。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有社會主義事業必然取得勝利的自信心，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馬同志在這裡所特別強調的“被群眾所認識”的自信心，都是不容易使人理解的。如果按照馬同志定的“內行人”標準來看，欲在普選的院務委員會中保證黨的領導，至少在今天，是值得研究的。難道黨的領導在今天變得不合法和不應該了嗎？

如此看來，既然我們的黨是相信群眾（這是黨始終不移的群眾路線）同時也是相信自己的，那么在人民群眾具有一定覺悟的今天，似乎不應該更沒有必要再說什麼黨的領導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意義和作用了。相反的應該提倡的到是只有充分相信群眾和站在一旁相信黨員自己的力量了。

為了明辨是非，澄清我們的認識，願意提醒馬如璋同志：這種論調正迎合了那些“表面上擁護黨的領導，由心里否定黨的領導”“要求與共產黨‘平分天下’”的人們的心里。這如果不是出自一時的不清醒，器重了個人的才能，則是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幾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的事實，有力的證明了黨的領導的正確，黨的領導是不容有任何削弱的。今後——如果希望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同樣健康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仍然需要黨的正确領導。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 問題學習參考提綱

(一)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 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是什麼?
2. 什麼是人民? 什麼是敵人? 在現階段, 人民和敵人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有什麼不同的內容?
3. 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性質上有什麼不同? 解決的方法有什麼不同?
4. 為什麼說: 在我們國家里,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
5.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 專政的作用是什麼?
6. 民主是目的, 還是手段? 為什麼?
7. 在人民內部, 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 為什麼既是矛盾的, 又是統一的?
8. 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 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 為什麼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 為什麼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9. 行政命令和說服教育的關係是怎樣的?
10. “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11. 為什麼說, 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果處理得不適當, 或者失去警覺, 麻痺大意, 也可能發生對抗?
12.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 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13.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 基本的矛盾是什麼? 我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 又適應又矛盾的情況是怎樣的?
14. 為什麼說, 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 還沒有完全建成, 還不完全鞏固?

(二) 肅反問題

1. 在肅反問題上有哪兩種錯誤的看法, 它們錯在哪裡?
2. 怎樣正確地估計肅反工作? 為什麼說, 有些人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 是完全錯誤的?
3. 為什麼說, 在肅反工作中採取了群眾路線, 毛病會比較少一些, 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
4. 怎樣估計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應當注意些什麼?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1. 那些說合作化不好了的議論, 為什麼是沒有根據的?
2. 許多人認為農民苦, 這意見就哪一方面說來是對的, 就哪一方面說來是不對的呢?

(四) 工商業者問題

1. 為什麼說, 剝削者的改造和勞動者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
2. 有人說, 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 只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

(五) 知識分子問題

1. 怎樣估計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 怎樣理解知識分子不要中途停頓, 更不要向後倒退?
2. 知識分子應當怎樣繼續前進? 為什麼說, 世界觀的改變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3. 怎樣使知識分子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
4. 為什麼說,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 就等於沒有靈魂?
5. 我們應當怎樣認識我們國家的現狀? 怎樣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

(六) 少數民族問題

1.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為什麼一定要搞好?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1. 為什麼要提出對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問題?
2.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

(八)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 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包括什麼內容?
2. 為什麼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 應

當通過自由討論、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

3.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發展?
4. 為什麼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 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我國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 現在具有哪些優勝的條件?
5. 在我們, 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 為什麼還可以對它批評?
6. 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為什麼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
7. 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應該採取什麼方針?
8. 批評錯誤思想的正確方法是什麼?
9.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 為什麼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為什麼說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
10. 在我們人民的政治生活中, 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
11. 為什麼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
12. 各民主黨派怎樣才能長期共存下去?
13. 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 只有在什麼情況下, 才能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

(九) 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

1. 發生鬧事與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有什麼關係?
2. 為什麼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個人的利益, 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 目前不少青年人有什麼弱點?
3. 為什麼我們不贊成鬧事? 我們應當怎樣對待少數人的鬧事?

(十)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

1. 怎樣理解“亂子有二重性”? 怎樣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2. 我們對世界大戰的看法應該怎樣?

(十一) 關於節約

1. 為什麼說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 反對鋪張浪費, 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 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1. 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是怎樣的? 發展工業為什麼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
2. 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有什麼重大意義? 應該抱怎樣的學習態度?

(轉載於北京日報)

(上接第一版)

於是在“良藥苦口”“愛護黨”“幫助黨”等幌子之下, 混在一般群眾及一般批評之中, 對黨施放毒箭。他們盡量夸大黨與群眾的矛盾, 夸大黨的錯誤與缺點, 把現實、把黨丑化, 打擊說正面話的人, 想把群眾引導到否定成績、否定黨的領導的道路, 而引誘群眾跟着他們走。這種手法也的確一時騙了一些人。但這種“混水摸魚”“趁火打劫”的策略, 也不是什麼不可想象的: 帝國主義者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不想正是利用蘇共揭發斯大林錯誤反對個人崇拜的時機, 而在“民主化”“反教條主義”等等口號下, 企圖在全世界掀起反蘇、反共、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列主義的普通真理的浪潮嗎? 難道匈牙利反革命分子不曾利用匈牙利黨的錯誤, 而否定過去的一切成就, 在“民主”、“自由”等招牌下, 誘騙群眾去實現他們用暴力使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嗎?

右派分子在向黨進攻的時候, 總是口口聲聲擁護黨的領導, 這點小策略也不奇怪: 難道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不也是為了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嗎? 難道修正主義者不也是他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嗎? 甚而美帝國主義者從未承認他反對世界和平, 但對於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 他們都用種種藉口來阻撓!

還要注意, 右派分子現在也只是主要地在思想上向黨進攻, 向群眾進攻, 力圖擴大其群眾基礎。如果他們的意圖得逞, 他們就要進一步

炊事員的聲音

六月十九日炊事員們聽到北醫炸彈事件, 激起了無比憤怒, 當天下午開了一次座談會, 大家怀着激昂心情, 發言踊躍, 內容摘錄如下:

我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趙堅等說: 教授治校是變相的奪取黨的領導權, 我們要共產黨領導, 反對別有用意的內行人治校論調。

向右派言論回擊

蘇豪等說: 誰說統購統銷搞糟了, 人民生活降低? 我們警告儲安平、葛佩琦之流, 我們善於明辨是非, 我們的生活比過去逐步提高了, 我們一致回擊歪曲事實的野心家!

和右派份子劃清界限

李殿選等說: 右派份子在幫助黨整風的掩蓋下, 散佈惡毒言論, 來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 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要擦亮眼睛, 和右派份子嚴格劃清界限。正確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限。

站穩工人階級立場

王同剛等說: 我們幫助黨整風, 必須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近在大“鳴”大“放”中, 無論在報上也, 大字報上也, 出現了不少不正常的現象, 有的借整風為名, 實行破壞陰謀, 說什麼人民事業被黨搞糟了, 反對黨在各方面的領導, 仇恨共產黨員。有的用謾罵式的批評, 污蔑黨的領導, 北醫炸彈事件, 明確地告訴我們, 反革命分子正在向我們開火, 我們要站穩工人階級立場, 向右派份子作無情的鬥爭!

全體炊事員們一致認為: 必須團結在黨的周圍, 做好工作, 現在再也不能在工資問題、福利問題上打圈子, 這些問題會作適當的解決, 現在是挺身而出, 打擊右派份子的時候了!

伙食科全體炊事員

談“社會主義倒不了”

木

全國人民同右派分子的鬥爭提高了每一個人的人類社會覺悟, 但是在鬥爭中也有這樣一些錯誤論調: “社會主義倒不了, 反正會有人和他鬥爭, 何必要我?” “右派的進攻未必有這樣嚴重, 黨未免有些大驚小怪”。

“社會主義的確倒不了, 右派的進攻也只會落得頭破血流”, 這自然是真理。然而這個真理的實現却不是自然到來的。

抱有上述糊塗觀點的同志, 正是右派分子所歡迎的。如果全國人民都和他們一樣, 那我們祖國被右派拖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陰謀豈不很容易實現了?

要說這些同志不贊成社會主義, 確也冤枉。但為什麼會有這種糊塗思想呢? 看來值得檢查一下: 內心中對社會主義的感情, 究竟有幾何?

進行“開放政權, 建立一個真正人民民主的國家”的政治鬥爭, 接着就是取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他們不是已在高唱“不勞而獲不是剝削”“中國資本家是勤儉起家”“上升為剝削者之後, 而是操勞更重”。 “政治經濟學許多地方我們不能接受。且不說中國人民反對走資本主義的路, 請問中國真能走資本主義的路嗎? 歷史已經證明, 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路, 別無他途。由此可見, 右派的進攻, 其性質是十分嚴重的。

右派分子這一進攻, 是帝國主義者、蔣介石、殘余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具有被打倒了的封建買辦階級的情緒的人所鼓掌歡迎的。他們也正在乘機活動, 和右派一起唱反共論調或做其罪惡的勾當, 其象跡已經日益明顯。(如在北醫扔炸彈, 如本院有署名屈平者配劉景芳的詩)。但是我們有些人, 由於政治認識不夠, 立場欠穩, 政治經驗缺乏, 却認不清當前的形勢, 為右派的言論所惑, 只看到這些言論的片面、表面, 而認不清其實質。因此把他們與一般批評建議(包括不完全正確的)等同起來, 在英明的黨中央及時與再三提醒後, 還在思想上轉不過彎來, 不自覺地做了他們的思想俘虜。(必須把這些人與右派分別開來)所以右派分子雖然極少數, 我們仍必須堅決與之鬥爭, 揭露其真面目, 使大家清醒過來。

右派分子現在已經日益孤立, 他們或則拋棄反動的幻想, 認真改造, 或則被人拋棄,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